

# 少年祖國行

## 徐東肉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刊 二〇〇一年五月重刊

謝副總統東閣先生，在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宵旰從公，勞苦功高，承他在百忙中，撥冗執筆為本誌寫了一篇情文並茂的「少年祖國行」，憶述五十三年前辭別雙親，遠離故鄉，前往大陸求學，從事教育文化黨政工作的艱辛往事，躍然紙上，歷歷如繪，是一篇愛國志士苦學成功最富教育意義的佳作，值得一讀再讀，編者在此謹向謝先生致最誠摯之謝意。

— 編者



本文作者謝東閣先生早年與夫人潘影清女士在廣州合影。

我生也不幸，自呱呱墮地來到人間，便成爲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可憐人，生活在差別待遇和極端不自由的黑暗環境中。我在故鄉二水公學（日人讀的稱爲小學）受小學教育的時候，雖然已經知道了身爲炎黃子孫這一事實，但因年紀小，沒有很好的方法表達我內心的不滿，直到我考入台中州立一中以後，隨着年齡增長，蘊藏在心頭對異族統治不滿的情緒，也愈來愈高漲。

### 血濃於水的民族意識

在就讀台中一中時，有幾件事給我刺激很大。共一是那時我們中學一年級讀的是日本歷史和地理，要到三年級纔唸到外國史地，而中國史地是編在外國史地中。我每讀到這門課時，就感到非常難過，我明明是中華民族的後裔，怎麼，讀自己民族的歷史地理，竟說是讀外國史地呢！不禁心中燃起一股民族自尊的怒火。

二是我的班上有十多位日本同學，他們都抱有高度的民族優越感，很看不起中國人，我們也看他們不順眼，經常引起民族意識的衝突，我恨不得有一天把他們通通趕回

民國五十七年本作者任台灣省議會議長與行政院副院長今總統蔣經國先生(左)握手晤談留影，中為查良鑑博士。



扶桑三島去。

除此，更引起我莫大反感的是有一位教歷史的日本老師，他姓秀島，講課的口才很好，尤其講楚霸王項羽的故事很生動。但他非常看不起中國人，上課時總要講些中國人的壞話，不是罵這，便是罵那。我聽了後異常不快，每當他罵到中國人最不講衛生時，我心裏就回罵：「我將來一定把中國環境衛生改善給你看！」當他又罵到中國沒有幾條鐵路，交通極不發達時，我心裏就想



本文作者在台灣省議會議長任內主持會議時之神情。

：「我要立志到大陸建設許多條鐵路給你看！」雖然這只是天真的想法，但也是反抗的報復，民族精神的激揚，更由此促成我千里迢迢回到祖國大陸求學的心願。

### 上海求學趣聞

少年時代的我，不知天高地厚，世道艱難，僅憑一腔愛國家、愛民族的熱忱，便毅然辭別雙親，遠離鄉井，去追求我那天真的理想。

那時日本人對台灣同胞返回大陸管制很嚴，我只好採用迂迴方法，借說投考高等學校赴日本，然後由日本買船票到上海，這是民國十四年四月間的事，時年方十九歲。



謝東閔先生公餘之暇在公園內餵白鴿時留影。

到了上海，因沒學過中文，連看報紙都看不懂，後來費了很大力量纔學會中文，先在沈家灣承天高級中學唸完高中，隨後考進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我插班承天高中時，常因語言不通而鬧出笑話。一次，有位愛開玩笑的同學對我說：「儂是阿木林，」我以為他問我是否廈門人，（上海話稱阿木林如廈門人，）便做着上海話回答道：「是格（是的），阿拉（我）是阿木林！」結果，引起哄堂大笑。

### 一位難忘的長者

提起我插班升學承天高中，也有一段曲折的經過。我年輕時候真疏忽，也不打聽一下國內學制是怎樣的，便冒冒失失在四月間到了上海，到後纔知與日本學制不一樣，是八月招生，九月始業的。在這一段日子裏，我除了努力自修中文外，鎮日無所事事，閒得發慌。雖然手頭不缺錢用，但我不甘心光陰白白荒廢，決定要找一工作，自食其力。一天，我在西摩路發現一幢小洋房，院子很大，可惜長滿了雜花野草，很不配襯，心想何不幫他整理，也是一個打工機會。正徘徊間，出來一位洋人，他用英語問我來意，我用英語回他的話，結果辭不達意。到了最後，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英文條子給他看，不料這位洋人竟會講日語，交談之後，非常同情我人生地疏的境遇，馬上介紹我去基督敎青年會看一位宗敎部長，這位部長也與我言語不通，先後找了一位上海人和一位講北平話的來翻譯，還是一樣不靈光，總算找來了謝扶雅先生，他是留學日本的，日語很不錯，才把問題解決了。

謝扶雅先生道德文章都好，尤富助人精神，他熱心替我奔走找學校，我永遠感念他。所以當我在廣州讀中山大學時，知道他正在廣州嶺南大學執教，曾專誠去拜訪過，直到前三年我輾轉得知他在美國的地址後，特別寫信申謝這段五十年前的往事，他纔記憶起來了。如今我們常常書信往返，他已年逾八旬，曾想來台定居，我立即覆信表示歡迎，終因年事過高及兒孫挽留而未能回來。

### 工讀的大學生活

民國十六年秋我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後，原以為可以專心一意讀書了，詎知命運多乖，就在入學不久，我父親和朋友在台灣經營的好幾個小糖廠都失敗了，家庭已無法再接濟我在上海讀書的費用，以後的學業，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這對遠離家門，漂

泊異鄉的遊子來說，實是一個非常深重的打擊。但我有堅毅奮鬥的求生意志，也有繼續求學的堅定決心，這時東吳有位同學知我在台灣受過日本教育，長於日文，便為我介紹教兩位欲留日深造的營長日文，兩人每月束脩共四十元，這四十元的收入，已足夠我在上海的生活費用。可是教了一年之後，兩位營長學生東渡日本去了，我又重新陷入經濟來源斷絕的困境。

我在上海期間，正逢總統 蔣公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光復京滬一帶，上海的武昌路在一夕之間，五色旗易幟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但殘餘的北洋軍閥部隊，仍然盤踞大江以北作負隅頑抗，澎湃的革命怒潮響徹全國，燃燒着每個血性青年的心。這時，國父在廣州手創為造就革命青年的最高學府——國立中山大學，正伸出溫暖有力的手，歡迎全國各省有志青年學生前來就學，對於越南、韓國、台灣和國內邊遠各地的學生，尤予優先容納。我於是決心離滬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經過一番甄試後，就很幸運地達到轉學法學院政治系二年級的願望。

到了廣州，我依然人生地疏，不諳當地語言，家中接濟又中斷，雖然當時中山大學的校長戴季陶、副校長朱驥先二位先生對我特別照顧，但吃飯和零用還得設法張羅才行。我在百般無奈中想到古人所說「窮則變，變則通」的名言，我認為我既懂日文，何不就朝這方面動腦筋？！

有一天，我到開在廣州「沙面」的日人雜貨店，想找些日文雜誌來參考，很湊巧找到一本東京出版的「文藝春秋」，發現內有一篇題為「接吻的起源學說」的文章，作者以社會學的眼光去分析男女接吻如何發生。經過研究，這位作者提出十種的原因，其中一種是說起源於「互毆」，因為在原始人類的搏鬥中，都是赤手空拳，等到彼此難分難解時，就用嘴唇來對咬，如果對咬的是男女，結果就不同了。漸漸的，男女咬嘴唇，不是在怒目相向的敵對情況下進行，而是在如膠似漆如糖如蜜的情況下進行。我覺得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好文章，倘若把他整理成爲中文，投寄到報紙副刊上，一定會登出。

因此便買了回來，立刻加以翻譯，並且自己加油添醋，改寫成六、七千字的長文，投寄到民國日報，不出所料，不幾天，文章刊出來了，得到稿費十七元五角。那時候物價低廉，一個月吃飯只要六元，所以那十七塊錢對我的幫助很大，不僅生活費暫時有了着落，而我會寫文章的名聲，也就在我們學校之中傳揚開來了。以後只要有空，我就源源投稿，寫稿所得，便足維持我的簡單生活了。這是我第一次靠賣文度過生活困境的經過；後來在香港又遭到另一次意外的厄境，同樣也是賴賣文解決了我一家的生活，但那已是離開中山大學以後的事了。

民國十八年，我已是中山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因為在過去一年當中常在報章雜誌上投稿，已薄有文名，恰逢本校法科編譯所計劃大規模翻譯各國名著，其中選定日人所著「中國經濟地理」一書約我翻譯，譯成後得到了三百元的稿費，對當時的情況來說，實在是個很大的數目。但我基於同情別人及自己身受過苦難的心理，除了留下一百五十元自用，其餘一百五十元則送給與我同時求學境况也極爲清苦的同學，以表「急難相助」之意。

### 長官師長恩情重

轉瞬到了民國二十年七月，我畢業了。蒙法學院院長栽培，破格推薦給校長聘我爲講師，留校任教日文。在中山大學，一個畢業生未經過助教階段而受聘爲講師，可以說是「不次之擢」，也是校史上空前的例子。

我回憶這段青年時代往事，深深感到祖國到處有溫暖，以我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小伙子，渾身飄蕩大陸，並且在後來家庭接濟中斷的情況下，如非師友給予援手，結果將不堪想像。迫我大學畢業完成後，又在總統 蔣公領導下，在粵、桂、閩等省從事教育、文化、黨務等工作，使我今日還有機會爲國家盡點力量，可說完全是拜長官與師友厚愛提拔之所賜。飲水思源，今後我當以有生之年，竭忠盡慮，爲反共復國神聖大業而努力奮鬥，以報答國家社會所施於我的恩情。